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当代政治哲学

[法]高宣扬 ©著



P H I L O S O P H Y

下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当代政治哲学

[法]高宣扬 ©著

下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政治哲学/[法]高宣扬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8

ISBN 978-7-01-008863-1

I. 当… II. 高… III. 政治哲学-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9239 号

当代政治哲学

DANGDAI ZHENGZHI ZHIXUE

[法]高宣扬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68.5

字数:110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08863-1 定价:1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当代政治哲学的典范论述	1
第一节 21 世纪“全球政治”的出现	1
第二节 政治的技术化	3
第三节 全球政治的市场化	15
第四节 政治哲学论述典范的转化	15
第一章 新政治哲学论述的特点	42
第一节 当代政治哲学论述的转变	42
第二节 政治哲学的论述性质	43
第三节 政治哲学论述中的“知识的意愿”	44
第四节 对政治哲学论述的“真理性”的质疑	46
第五节 论述及其实践的政治性	48
第六节 后现代政治论述的特征	50
第七节 现象学的诠释模式	63
第八节 女性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论述	86
第九节 当代政治哲学论述转变的基本条件	127
第二章 美英政治哲学传统的转变	128
第一节 研究前沿的一般状况	128
第二节 罗尔斯:以正义的名义批判功利主义	132
第三节 诺齐克的“放任型自由市场模式”	138
第四节 新保守主义的复兴:列奥·斯特劳斯	141
第五节 诉诸新公民社会的社群主义	142
第六节 多元化的新理论场域	144

第七节	英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转型	152
第八节	季登斯的“现代性政治哲学”	186
第三章	德国政治哲学传统的新变化	235
第一节	德国当代政治哲学的一般特征	235
第二节	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	245
第三节	斯洛德岱克的“生命政治哲学”	414
第四节	鲁曼的社会系统与风险政治哲学	417
第五节	阿尔诺德·格伦	463
第六节	赫弗的正义论	481
第七节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	483
第八节	阿克瑟尔·霍内兹的社会哲学	485
第九节	赫尔穆特·柯因的法哲学	490
第十节	依凌·菲彻尔的马克思研究	491
第十一节	敏科勒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491
第十二节	贝克:风险社会的政治哲学	493
第四章	法国政治哲学论述典范的变革	497
第一节	当代法国政治哲学的一般状况	497
第二节	在生存世界中探索人的自由	517
第三节	福柯政治哲学的诞生及其影响	562
第四节	德里达政治哲学的典范论述	591
第五节	利奥塔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特点	631
第六节	利科的现象学政治哲学的特征	647
第七节	列维纳斯	667
第八节	让·吕克·南希政治哲学的艺术模式	680
第九节	吕克·费利和阿兰·雷诺的新自由主义	684
第十节	贾克·朗西耶的“图像政治论”	687
第十一节	布迪厄的象征性政治哲学	688
第十二节	雷蒙·阿隆	797
第十三节	萨特	809
第十四节	阿尔杜塞	838
第十五节	德勒兹	847

第十六节 贾克·朗西耶	849
第五章 拉丁美洲的政治哲学	852
第一节 当代拉美“第一代”政治哲学家	852
第二节 法兰克及其“依赖理论”	855
第六章 政治的基本问题及其时代性	872
第一节 政治的基本定义	872
第二节 现代政治的特征	906
第三节 政治组织及其制度的性质	921
第四节 政治的改革	935
第七章 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944
第一节 对于政治的性质的哲学探讨	944
第二节 政治哲学的基本模式	992
参考文献	1009

第四章 法国政治哲学论述典范的变革

第一节 当代法国政治哲学的一般状况

法国的政治哲学,在 20 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内,曾经由 19 世纪流传下来的柏格森主义、新经院主义(Néo-Scholastisme)和人格主义(Personnalisme)所统治。

柏格森的政治哲学紧密地与他的生命哲学联系在一起。柏格森一生始终不停地思考哲学和生命的基本问题,并试图一再地探寻新的可能性,重新依据科学和文化的最新成果的启发,推动他的哲学思路在生命自身的创造演进中不断更新。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怀疑传统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基础,试图根据当时科学的最新发现,全面反思达尔文进化论及其他实证科学的基本原理,再反过来重复思考从生命的角度进行哲学改造的可能取向。柏格森为此指出:他所感兴趣的,毋宁是无法通过数学还原的“非空间化的无形的生命时间”,即“在思想中运作的生命的延绵”;它既不是笛卡尔、牛顿、康德等人源自自然科学模式的时间概念,也不是罗素、爱因斯坦等用最新数理逻辑或相对论公式所可以简单概括的。

生命的奥秘,在柏格森看来,就在于穿透在时间复杂脉络中的本质性思想的“创造的演进”。因此,真正的科学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哲学,必须以揭示“生命”、“思想”、“时间”和“语言”的四重交错关系及其运作逻辑为己任。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时间”就是现代哲学所必须优先思考的“绝对”(L'Absolu)。

显然,如果说柏格森极端重视哲学与科学的新型关系的话,那么,他所理解的科学,绝不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框架中的科学,而是对于生命发展中的思想、经验、语言、感情、意志和艺术创作想象力等复杂因素以及带有一

定神秘性力量的交错多变网络的观察和直观体验,特别是必须通过生命在时间的无形隧道中的“创造性进化”去把握世界的存在奥秘。

一、生命的特征就是创造

生命的无限创造精神,既表现在肉体行为在时空上的不断运动变化,也表现在精神生活在质的层面的无限多样的异动可能性。肉体和精神心灵的生命的创造性演进,并不单纯停留在可观察到和有形的现实世界,而是在现实与可能相交错的复杂场域中进行;必须超越现实和“客观存在”的领域,探索可能性、潜在性和偶然性及其与现实的交错关系。

因此,生命的延绵并不只是体现在可观察的时间连续性,也不只是呈现为单向的一线性延续,而是与极其复杂的中断性、断裂性和交错性形成盘根错节的乱麻团,同时又内含着难以预测的张力关系的变动可能性。

归根结底,生命的这种延绵性,主要是由其内在本能的“生命冲动”(élan vital)所推动。因此,它在本质上是质的多样变动性的呈现,因而也往往导向超越现实的多种异质倾向。实证主义所关心的重点,是现实的“客观”存在的对象或“事实”,而他们所依据的知识、理性和经验,都只能停留在对于事物的表面认识和“检验”,所以,这种方法虽然号称“科学”,但始终无法揭示生命的内在创造本质。

生命的创造的演进,固然远远超出实证主义的观察范围,而且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让·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 1907—1968)在比较柏格森与海德格尔的时间观的时候,特别强调两者的生命观和时间观的差异。^①

伊波利特指出:海德格尔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努力,无疑推动了哲学家对生命的探索进程。但海德格尔仍然强调具有一定“主体”意义的单个性的特殊“此在”(Dasein)的中心地位,使生命的复杂性、偶然性、断裂性、重复性、深不可测性、突发性、细腻差异性以及多方向进取性等,都被“此在”的“在世生存”所限定。

柏格森认为,实证科学固然难以理解生命的奥秘,而且,单个的“此在”的任何“抉择”、“诠释”和超验努力,也都无法掌握生命深层隐含的“非人

^① See Hypolite, *Bergson et Heidegger*. Paris. 1948.

性”创造力量。所以,伊波利特得出结论说:“整个柏格森哲学可以压缩成这样一句话:‘哲学应该成为超越人的一般条件的努力’(Toute la philosophie de Bergson pourrait se condenser dans ce texte: ‘La philosophie devrait être un effort pour dépasser la condition humaine.’)。”^①

二、生命就是自我启动和自我限定

生命不是现实存在中的有形体和客观对象;它不在它的目的、表现过程和终点中表现它的本质。生命固然有生有死,有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形式及其限制,但它的本质却不在现实展现出来的“结果”、“形式”或“结构”上;生命的真正奥秘,深藏于其根源及其原动力。这是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冲动”,它是其自身内部的生命倾向的自我表演,它始终是自己展示、自己决定、自己选择、自我限定和自我变动的多种趋势的力量合成。

三、生命运动的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

柏格森强调指出:生命始终处于运动中,而且,由于它的动向和绵延趋势只决定于内在的“生命冲动”,所以,生命属于可能性的范畴。传统的因果关系、前后系列观以及具体和抽象的对立关系等,都不能真正把握生命时间的本质,尤其无法揭示其可能倾向。正因为这样,柏格森很重视最新数学和自然科学对可能性、或然性、潜在性、偶然性和混沌领域的探索成果。

柏格森曾经和彭加勒以及爱因斯坦等数学家、物理学家一起探索相对论、微积分、混沌理论等,试图从中受到启示,进一步说明生命的可能的复杂变动趋向及其内在根源。尽管如此,柏格森仍然不愿意停留在自然科学的现成成果上,更不打算简单搬用自然科学的公式。

柏格森在他的《创造的进化》中尖锐地指出:“理智恰恰是以对生命的自然不可理解性作为其特征的”(l'intelligence est caractérisée par une incompréhension naturelle de la vie)。^② 生命的复杂性和变动性的真正根源,既然内含于生命自身之中,那么,人们没有任何理由非要在生命之外,把生

^① See Hypolite, *Bergson et Heidegger*. Paris. 1948.

^② Bergson, *Evolution créatrice*. ; Cf. Bourgeois, *L'Evolution créatrice d'Henri Bergson*. Paris. 2007.

命当成被某个主体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从外部”对它进行指手画脚的“说明”。柏格森坚信传统科学对生命的研究方法将是徒劳无益的。

由于柏格森一直受到法国的心灵哲学(philosophie de l'esprit)的教育和影响,又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缺乏信心,使他宁愿诉诸从普洛丁以来的神秘主义。

近50年来,法国及西方哲学界在重评启蒙的过程中,针对启蒙时代前后对神秘主义的排斥以及现代性思想本身的悖论的日益暴露,对神秘主义的研究有越来越加强的趋势。重评启蒙是与重评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同时进行的。同样的,对柏格森哲学的重评,特别当涉及极其复杂的生命论题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同意柏格森的看法:不能排斥神秘主义的积极意义。^①

四、生命的基本形式是延绵

生命的延绵不同于时间。时间虽然也表现延绵,但它只是从“量”的多样性(multiplicité quantitative)出发,因此它只是属于数学的研究对象;与此相反,生命的延绵是从质的角度,是质的多样性(multiplicité qualitative)的表现。柏格森指出,生命的展现过程,就是“维持自身”(La vie est maintien de soi);而维持自身就是在它自身范围内实行自我开放和自我展开。一切生命过程,都是力图通过自身的维持和延续,来不断弥补和补充生命自身的欠缺。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就是“活着”,就是“延续生存”(survivre)。这就是“延绵”(la duration)的本意。

这就意味着:生命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它不是通过一次性的创造活动就可以一蹴而就的。生命需要在它的延绵中实现一再的更新化的创造活动。正是通过一再的超越,永不满足地实现更新,生命才能克服原先的欠缺,不断地弥补其生存中所感受的“不满”,填补其部分的“空虚”,也补偿其消耗的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理论,一方面不同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排斥“超越”;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基督教神学所说的神创论,以为万能的神只需在一次性的“创世”奇迹中,就可以完备

^① See Janicaud, D. *Une généalogie du spiritualisme français. Aux sources du bergsonisme*. Paris. 2003; Cariou, *Bergson et le fait mystique*. Paris. 1976.

地和一劳永逸地造出一切事物。

柏格森所主张的生命绵延是指生命存在过程中的不断超越。所以,绵延也是“超验”(la transcendance)。

五、生命的自由本质

在可见的生命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始终维持和延续生命本身的存在及其创造活动?柏格森在30岁的时候发表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开宗明义地宣称:“我们必须通过语词表达,而且我们往往要在空间中思考。也就是说,语言要求我们在观念之间,确立像物质对象之间的明确间断性那样的清晰的区别性。采纳这些,固然有利于实际生活,而对大多数科学来说也是很必要的。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由一些哲学问题中所产生出来的各种不可克服的难题,难道不就是因为人们往往硬要把本来不占据空间的现象固执地在空间中堆积起来吗?……为此,在各种问题中,我们选择了形而上学和心理学共有的自由问题。我们试图借此指明,在决定论者及其对立派之间的所有争论,都蕴涵着对延续和广延性、连续性和同时性、质量和数量之间的预先的混淆。一旦消除这个混淆,人们也许可以看到:一切旨在反对自由的言论都将烟消雾散。”^①

在柏格森看来,历史上环绕人和世界的而发生的一切传统哲学争论,其目的无非就是试图寻求剥夺生命自由的论据。相互对立的旧形而上学的理论的共同点,就是柏格森所揭示的上述一连串的“混淆”,即通过他们的时间和空间的论证,把生命的历程纳入他们所设计的各种时空学说中,以达到剥夺生命自由的目的。柏格森创立的生命哲学,旨在驳斥传统形而上学的两大对立派别,即决定论及其对立派,使生命真正摆脱他们所设置的圈套,不再相信他们所散布的关于延续和广延、连续性和同时性、质量和数量的相互混淆的传统论述,获得真正的自由。

生命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决定和自我创造的独立单位;也就是说,归根结底,生命是自由的。

为此,柏格森对康德的自由观进行批评,因为康德一方面混淆了时间和

^① Bergson, *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In *Bergson Œuvres*. Paris, P. U. F. 2001 (1959): VIII; Kant, *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1797.

空间,强调在经验的感性时空系列中,人是受到因果性和必然性的限制,没有自由;可是,另一方面,康德又把自由推到时空之外的领域,以为只要人遵循理性,归属于理智世界,就可以独立于自然规律而获得自由。^①

生命的自由性恰恰来自它的非空间性和非时间性。生命超出了空间和时间系列的范围,不需要具有连续系列性质的空间和时间的约束,也不需要前后左右的顺序性和秩序性。生命的自由使它可以交错重叠、毫无秩序地存在和展现,就像后来德勒兹在他的《论折叠》的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②

生命的自由建立在心理状态的强烈紧张性(l'intensité)和意识状态的多质多样性(la multiplicité)的基础上。因此,《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的前两章先逐步地论证完全不同于物质的心理和意识的特殊性,然后,柏格森才清楚地论证自由的本性。

在纪念柏格森的《创造的进化》发表100周年时,法国科学院院士兼法国哲学学会主席贝尔纳特·布尔乔亚指出:“柏格森的自由观是与他的生命自我创造观相一致的。对柏格森来说,生命的存在就意味着创造,也就是摆脱进化论所说的自然选择规律,只凭借生命自身的自由创造,就可以实现生命自身的存在方式。”^③生命的延绵就是不停顿的创造的延续,是一次又一次的事件的重演和更新。每次创造都由生命自身开始,无须以前期的生命创造作为基础或出发点,也无须决定于外在的规则。所以,每次创造都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自由行动。

1932年,柏格森在他的《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源泉》一书中,揭示了现代人被困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牢笼中,以致造成近代民主制的“非自然化”。^④柏格森指出:近代民主制的基本精神,就是将自由与平等结合在一起,但是,现在,“人类呻吟着,半死不活地被压在人自身所造成的进步之下”。^⑤柏格森因此说:20世纪的政治需要增补它的灵魂。^⑥柏格森建议,

① See Bergson, *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② See Deleuze, *Le Pli. Leibniz et le Baroque*. Paris. 1988.

③ Bourgeois, *L'Évolution créatrice d'Henri Bergson*. Paris. 2007.

④ See Bergson, 1963[1932]: 1023—1215.

⑤ Ibid.: 1245.

⑥ Ibid.: 1239.

为了拯救处于危机的政治,人类精神必须简单化,同样地,也要使已经被复杂化的疯狂,加以节制。^①在柏格森的政治哲学中,显然还保留着强烈的自然法精神,而他在面对现代政治危机时,也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人类自己对自身理性的节制。与此同时,新经院主义的两位杰出思想家,吉尔松(Etienne Gilson, 1884—1978)和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率领着由他们所培育出来的卢汶学派(l'école de Louvain),不仅在形而上学领域,而且也在政治哲学中,独占鳌头。新经院主义者将中世纪的学说加以翻新,结合20世纪初人们心理的特征和当时的社会要求,推出了一系列新型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观点。吉尔松和马里坦各自就国家、主权性、自然法以及民主制等重要问题,发表了划时代的著名作品。^②

吉尔松在《上帝之城的演变》(*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cité de Dieu*, 1952)指出:现代民主制符合圣奥古斯丁关于“上帝之城”的基本原则,因为民主制是在基督教合理性概念的引导下创立,并在同样的理念下,经过多世纪的探索,逐步完善起来。

马里坦在他的《人与国家》一书中,强调民主制必须建立在政治生活的道德理性化的基础上。马里坦说:“只有通过民主制,才有希望使政治实现一种道德理性化的过程,因为民主制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自由的合理的组织。”^③马里坦等人提醒哲学家们,更多地重视以合理性为基础的人权问题和世界的政治统一化过程。马里坦等人的新经院主义政治观点,很快地转化为人格主义的思想。在他们的后继者牟尼耶(Emmanuel Mounier, 1905—1950),更进一步使新经院主义政治思想转化为强调个人的人格的人格主义政治哲学。对于他们来说,人的基本特征就是其生活世界、人格以及社会生活的人格化。也就是说,人及其世界,特别是他们的政治活动的特征,就是以尊重每个人的人格为最高准则。这种人格主义政治思想,尽管很快地让位于存在主义,但却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整个政治哲学的发展,因为他们对于人格的个性的重视,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20世纪政治哲学主流,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

① See Bergson, 1963[1932]: 1237.

② Gilson, E. 1951; 1952; Maritain, J. 1953.

③ Maritain, J. 1953: 53.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法国政治哲学,虽然可以分为许多派别,但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地看到其中的三大主流思想:存在主义、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中,最有成果的,就是属于这三大派别的哲学家萨特、卡缪、马尔塞、梅洛-庞蒂、加洛迪、勒菲柏勒、阿尔杜塞、利科、柯杰夫、雷蒙·阿隆、埃里克·维尔(Eric Weil, 1904—1977)、西蒙·维(Simone Weil, 1909—1943)、西蒙·戈雅·法卜勒(Simone Goyard-Fabre)等。他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当代法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起,法国政治哲学的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兴起,给哲学家提供了分析和研究政治的新观点和新方法。福柯、德里达和布迪厄等人,把解构主义和尼采及海德格尔哲学结合起来,都对权力、国家、民主制、正当化、社会正义等问题感兴趣。他们采取了反历史和反主体中心主义的立场,重新探讨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接着,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建构了自己的新政治哲学体系。利奥塔等人,根据他们的新型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观,提出了一整套的后现代政治哲学理论。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法国哲学界又出现了以阿兰·雷诺、昂里·米歇、让·吕克·马里埔及状·吕克·南希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哲学流派,即批判从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又反思自康德和卢梭以来的自然法理论及契约论,并结合欧盟的建立和苏联解体的经验,提出了新的政治哲学理论。

由此可见,法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基本上与一般哲学思想的演变相适应。总的来讲,当代法国政治哲学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50—60年代,第二阶段是60—70年代,第三阶段是80年代之后至今。

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就是萨特、梅洛-庞蒂、雷蒙·阿隆、阿尔杜塞、柯杰夫和埃里克·维尔等。

自称存在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萨特的政治哲学,在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中典型地表现出来。萨特当然并没有围绕传统政治哲学的论题来阐述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萨特更多地从他的实际斗争的需要,特别是依据他本人在理论创造中所关切的主题,论述他的政治哲学观点。为此,他一方面批评当时已经兴起的结构主义社会历史观,另一方面集中论述了他为综

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而提出、以“实践”(la praxis)概念为核心的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萨特的政治观是以他的辩证的历史观为基础的。

作为萨特的基本政治哲学概念,所谓实践,是指存在主义所关注的个人的实践(la praxis individuelle)。但为了使个人实践跳出存在主义的狭隘范围,萨特试图通过它的“总体化”(la totalisation)过程,实现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过渡,从而完成萨特所想要实现的目标: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的结合。萨特写道:“人的关系的唯一可理解性(l'intelligibilité),是辩证法。在每个以稀有性(la rareté)为基础的特定历史时代中,这个可理解性,只能在相互对立中表现出来。因此,不仅作为实践的阶级斗争,只能通过辩证法的解读,才能被理解,而且,在人类的多样历史中展现的辩证法本身,也只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为进行中的辩证合理性的实现过程而产生出来。”^①因此,在萨特那里,实践是人的尺度和真理的基础,而辩证法是“分析理性”(la raison analytique)的永久的解析。^②

在20世纪60年代,萨特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实际上远远超过政治哲学的范围,涉及政治哲学的基础——社会历史的性质。萨特指出:结构主义之所以否定历史的存在,以断裂性和共时性取代连续性和发展性,是为了整个地否定马克思主义。萨特坚持要从特定历史环境的特点出发来分析一切政治问题。所以,当涉及结构主义所说的“无主体的历史”和“人已经死去”的时候,萨特再次引用他在1946年就明确主张的历史“环境”(la situation)的概念。他指出:民主制所主张的抽象的自由主义,表面上认为,犹太人、中国人、黑人都应该享有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但自由主义者宣称,犹太人、中国人和黑人的自由权,只是当他们作为普遍的人的时候才有效。显然,民主制所主张的自由和人权,在具体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便失去了它的有效性。^③由此出发,萨特也明确地说:“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具体的犹太人、基督徒、天主教徒、法国人、

① See Sartre, 1960: 744.

② Ibid.: 741.

③ See Sartre, 1946: 233.

英国人、德国人、白人、黑人和黄种人。”^①

梅洛-庞蒂是另一位发生强烈影响的存在主义政治哲学家。梅洛-庞蒂不同于萨特,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一种冷静谨慎的态度。当法国政治家皮埃尔·蒙德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在1962年发表《近代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derne*)的时候,梅洛-庞蒂也表现了类似的政治立场,但他无意将自己列入一定的政治营垒中。尽管梅洛-庞蒂无意卷入政治旋涡,但他始终关切政治的命运,这使他能够以较为客观的立场,密切注视政治的发展方向,并及时地在当时比较普及发行的《现代杂志》、《快报》和《世界报》等报刊上,发表他的富有洞见的政治评论。

梅洛-庞蒂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段演变过程。他早期曾经对马克思和胡塞尔的思想表现出一股强烈的热情。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段时间内,梅洛-庞蒂曾经对现代自由主义进行尖锐的批评。他坚持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人,不应该像自由主义所鼓吹的个人主义的个体,而是应该相互共存,应该以“主体间性”的方式,生活在生活世界的群体中,应该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他在《辩证法的历险》中强调人的相互支持性。“单独的主体是零,独自一个人是没有自由的。”^②同样,他也强调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重要性。但他主张: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人才有希望通过实践而与人、群、理事会合在一起。在历史的实践中,人永远摇摆于历史的旋涡之中,一会儿被历史的辩证法所威胁,一会儿又返回历史的轨道。20世纪50年代之后,梅洛-庞蒂发现苏联劳动集中营的存在,并因此逐步地采取批判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立场。由此导致梅洛-庞蒂与萨特的分歧。梅洛-庞蒂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找到进行政治改革的希望。他在《辩证法的历险》中说:“历史中存在一个中心,这就是政治行动;在它的周围是文化。”^③因此,梅洛-庞蒂的政治,就是一种包含文化因素和人道主义理念的相对主义政治。

结构主义的政治哲学的重要代表是阿尔杜塞、福柯等人。他们两人虽然都宣称结构主义,但他们都同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有所不同。阿尔杜塞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而福柯则把结构主义同他的新尼采主义结

① See Sartre, 1946: 233.

② See Merleau-Ponty, 1955: 276.

③ Ibid.: 212.

合在一起。所以,无论是阿尔杜塞,还是福柯,都不过是采用了结构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哲学的思想家。我们将在专门章节进一步详细论述他们的政治哲学理论。

在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争论中,雷蒙·阿隆是作为中间人的身份发表他的具有独特立场的政治理论。雷蒙·阿隆以《历史与暴力的辩证法》(*Histoire et la dialectique de la violence*)为题,阐述他的基本观点。阿隆一方面把《辩证理性批判》说成是一种“摧毁性和魔鬼式的”,另一方面又客观地分析其中所论述的问题。阿隆说:《辩证理性批判》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读。从萨特的思想来说,这本书有双重好处。就其思辨的利益而言,它是与实践的理论为基础,在强调个人意识的“自为”(pour soi)能力和实践的范围内,建构一个关于集体的概念。另一方面,就其实际利益或政治利益而言,《辩证理性批判》要论证实践克服异化的可能性;因为萨特毕竟看到了实践本身的惰性(inerte)及其异化(aliénation)的倾向,所以,萨特极力论证:在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中,应该可以靠非暴力的方式,保障实践的自由性质。从萨特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关系来看,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试图论证历史对人的实践的总体化过程的正当性,同时也由此寄托解放全人类的希望。^① 阿隆最后强调萨特的存在主义与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可协调性和矛盾性。^② 雷蒙·阿隆的政治哲学散见于他的一系列评论政治问题的著作《从一种神圣家族到另一个:论想象中的马克思主义》、《进步幻想的破灭》、《论自由》、《为颓废的欧洲辩护》、《想象中的马克思主义》及《找不到的革命》等。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萨特与列维·斯特劳斯的争论,推动着法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建设的进程。从那以后,福柯、德里达等人,从结构主义出发,进一步提出他们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政治观点,把重点指向整个传统政治理论及其基础。福柯在他的法兰西学院课程中,集中转向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国家权力的专制及其权术策略。他在《监视与惩罚》的监狱史著作中,揭露近代政治制度对人的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监视、规训、宰制、监管、控制和统治的性质及其策略。福柯针对边沁所发明的“全方位监控

^① See Aron, 1973: 13-14.

^② See Ibid. : 33, 59; 225-226.